

徐渭书画艺术

苏东天 著



天津 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天津发行所经销

天津美術印刷厂印刷

1991年 7月 第1版

1991年 7月 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4.375 插页: 30 千字: 84 印数: 0001 3000

ISBN 7-5305-0118-6/J·0118

定价: 11元



徐 渭 肖像

目 录

序	冯其庸 (1)
一、序说	(3)
二、徐渭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变化	(5)
三、徐渭的绘画艺术及其成就	(20)
四、徐渭年表	(36)
(附录一) 对徐渭《四书绘序》理解之误	(43)
(附录二) 徐渭题画诗跋选	(45)
(附录三) 徐渭书画简目	(58)
附图	

序

冯其庸

徐文长，为明一代的大文豪、大怪杰。在文学艺术的这个园地里，他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全才。这一点，我思索了很久，觉得似乎只有宋代的苏东坡，与他相仿佛。苏东坡于诗、词、书、画、文章，无一不能，而且无一不精。徐文长也是这样，甚至还比苏东坡更宽广一些。例如，徐文长除诗、词、书、画、文章外，他还能戏曲。对戏曲，他不仅从事创作，还注意到民间戏曲的叙录和研究。他留下了《南词叙录》这样一部最早记载南戏的重要文献。在绘画方面，他更是山水、人物、走兽、花卉、翎毛无一不能，无一不精。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的画开了明清之际文人画的先路。文人画并不是从明代开始的，美术史家们一般从唐王维就作为文人画的开始了，如宋代的苏东坡的竹石，米元章的山水，扬无咎的梅花，赵子固的水仙、兰花，南宋郑所南的兰草，都是属于文人画的一系。但徐文长的文人画，却与以上这些不同。他所追求的是写意写韵，而不是写实写真。那末，苏东坡和郑所南等人的画，是否只有实和真，没有意和韵了？这当然并非如此。东坡胸次高旷，如前世太白，所作书画，皆有意韵。但他画的竹石，都较注意形态的真实，他的意和韵，是通过形态的真实表达出来的，他是寓意韵于真实的形象，所以他与文同等的画竹是属于一系。他们的画当然好，高标逸韵，自有我在，为历代重宝。然而徐文长却与他们不同，同样是文人，同样是文人画，徐文长却独辟蹊径，走着自己开辟的道路。他的画，逸笔草草，随意点染，于不经意处，意象俱得，意韵自新。看他的画，令人想起宋代梁楷的减笔画，梁楷的作品，泼辣粗放，用笔极简，而形神皆备。这种画法，是梁楷的独创，在梁楷以前，尚无所见。按：《南宋院画录》引古汴赵田俊的诗说：“画法始从梁楷变，烟云犹喜墨如新。古来人物为高品，满眼云烟笔底春。”《院画录》引梁楷同时代人的说法，指出“画法始从梁楷变”，这应该是可信的。但梁楷除这种减笔画外，他还作比较工细的人物画，这又是完全继承传统画法的一方面了。可见梁楷作此减笔画，虽极成功，于后世影响甚大，但在他说来，既是创始，也是尝试。因此，这方面的作品，传世的并不很多。徐文长的画，则不然，无论那一种题材，到他手里，都是逸笔草草，如作草书，又如作漫画。构图于平实处见新意，用笔于奔放处见含蓄，既有梁楷的减笔之妙，又不象梁楷那样外露。用书法来比喻，梁楷有如飞白草书，徐文长则是右军《十七帖》和《丧乱》帖。我昔年曾有一首题墨葡萄诗：

青藤一去有吴庐，传到齐璜道已疏；

昨夜山阴大雪后，依稀梦见醉僧书。

我诗中的一层意思，就是认为徐文长的墨葡萄及其他一些画，都是从草书中来的。是取草书的笔意用之于画。本来书画同源，画家常常可以从书法中取得神悟的。如果说，梁楷是创始和尝试，那末徐文长既有创始的意义而却非尝试了。说他有创始的意义，是他

不仅减笔、逸笔草草，而且与梁楷的奔放外露，剑拔飞扬大不相同。他可以说奔放而不外露，飞扬而不剑拔。但这还是其次，更主要的，是他的这种画法，施之于任何题材，无所遮拦，无论山水、人物、走兽、花卉、翎毛、无不如此，而且无不极尽其妙！从这方面来说，他又带有创始的意义。为什么说他不是尝试，因为如前所论，他全部作品，都是如此。其笔法用墨之圆熟，画品境界之高，皆臻上乘，可以说是意到笔随，如行云流水，无不能至。徐文长的草书，也同样臻此神妙境界。一如其画，一如其人。

说到徐文长其人其遇之蹇之惨，也是画史上少有的。这方面，本书著者已有详细叙述，此处可以不赘。但他自题墨葡萄诗，却可以一提：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首诗，简直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写照，是诗化了的徐文长。凄凉、冷落、明珠闲抛，自生自灭，一代奇才，竟在这样的境遇中困死于破草席上。这与后来的曹雪芹，恰好是先后同其命运。

这就是旧时代给于天才的待遇！

徐文长的故居在绍兴，就是著名的“青藤书屋”。1969年我下放到江西干校，特意到绍兴去了一趟，找到了“青藤书屋”。可是恰好碰到正在将它拆除，据说要改建工厂。我目击此情此景，仿佛见到徐文长当年又一次地遭到了打击，我看着那株历经风霜的“青藤”和举世皆知的“天池”，还有徐文长自书的“一尘不到”的匾额，实在感到痛心。满以为徐文长以及其他许多张文长、李文长总该永远摆脱黑暗时代的命运了，谁知“四人帮”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我只能含着满腔的热泪和满腔的悲愤悄悄离去。

前年，我又到了绍兴，意外地见到“青藤书屋”恢复了，已经拔去的“青藤”无法复活，只好从深山里找到一本古藤移植过来，这到仿佛早被“闲抛闲掷”的明珠，又被拣了回来加以精心保藏。已经被填死的“天池”，又被重新挖掘了出来，一泓清水，可鉴人面。特别是那块“一尘不到”的旧匾，居然原物陈列了出来，我看到这一切，不能不由衷的高兴，由衷的感到今天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充满着希望的时代！

苏伟堂同志的这本关于徐文长的专著的出版，也同样使我感到兴奋。他要我写篇序，我于徐文长虽有爱好而无研究，不得已，只好写些零碎的感受，其间恐怕说错的和说对的只能各居其半，误人之处，只能请专家和知者来纠正了。

— 序 说

以朱元璋为首的农民起义，在推翻了残暴的元朝蒙古贵族统治之后，建立了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中心的明朝封建帝国的强大统治。在明初，由于朱元璋采取了解放奴隶、鼓励垦荒，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政策，和扶植城市工商业、手工业，打击贪官污吏，抑制豪强，缓和民族矛盾等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从而使国家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农业、工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使各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至永乐宣德时期（1403—1435）便出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明实录》称“宣德之治”为：“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羨，闾阎乐业”，“田里安业，四裔宾服”。明朝从太祖到宣宗时期（1368—1435），国力是不断上升的。

永乐皇帝明成祖，雄才大略，对外采取友好的互通有无的政策，又派郑和七次下“西洋”，加强了与南洋、中亚、日本、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国外市场的开拓，促进了国内城市工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因素不断地萌芽起来。

但自英宗（1436—1449）之后，明帝国就开始走向下坡路，宦官邪派互相勾结起来，弄权朝廷；到武宗（1506—1521）之后，邪派形成阉党，控制朝堂内外，正派的人士再无进身之机了。徐文长生活的年代，正是继武宗之后的嘉靖世宗（1522—1566），隆庆穆宗（1567—1572）和万历神宗（1573—1619）临政时期，系政治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嘉靖皇帝昏庸腐败，迷信神仙、丹药，二十年不理朝政，由严嵩父子窃取权柄，结党营私，内外勾结，卖官鬻爵，贪污腐败，专横跋扈，祸国殃民。由于国力日弱，引起北方俺答的侵扰，东南沿海倭患的日益严重，内外交困，明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了。隆庆、万历的名相张居正，也仍然是依附宦官，属阉党统治，政治的黑暗并无多大的变化。大地主、大官僚、藩王们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苛捐杂税有增无已，人民大批失去土地，或结聚山林为“盗”，或流入城市当佣工；城市工商业也由于课税不断加重，遭到摧残。再加水旱灾连年发生，人民流离失所，各地饥民和城市失业手工业者，纷纷集结起义，规模越演越大，此起彼伏，如长江、黄河汹涌的波涛，再也不可抑止，直到汇成明末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海洋，淹没了这个腐朽的明王朝。

徐文长所处的时代，由于政治的黑暗，社会风气的腐败，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报国无门，正派官僚遭受排斥，甚至无辜遭受杀戮，因此，朝野逐步形成了一支反对阉党专权的派别和社会势力。他们一面要求开放言路，让朝野公开讨论时政，实行改良，挽救危亡；一面要求开放仕途，反对阉党专权。但各代皇帝，只想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是利用这派来打击那派，就是利用那派来压制这派，致使朝廷内外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复杂、尖锐化。随着明王朝统治的动摇，禁锢人民，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的程朱理学，也随之动摇了。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提出，原想以取代

程朱理学，以救治明王朝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的。但由于他对程朱理学发表了一些反对崇拜旧权威旧教条的言论，如“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 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还说：“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答罗整庵书》）。他这些话的目的在于对抗朱熹的权威而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后来李贽、黄宗羲对封建礼教，君权思想的批判多少也是受其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这尤其给当时那些正直的富有进取精神的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使褒贬朝政的清议风气更盛。一时朝野互相呼应，反对朝廷腐朽的政治，反对阉党专政，反对贪官污吏要求改良政治的舆论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部分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便以文学艺术为武器，来暴露社会的各种矛盾，发泄胸中的愤懑。这些作品，往往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城市市民阶层的欢迎，因此，嘉靖 万历间，戏曲、小说、诗文、书画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徐文长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他不仅投身于反对严嵩集团的斗争，积极地参加抗倭战争，和参预整治北方边关，抵御蒙、满军事集团侵略的防卫工作，而且倾注一腔热血，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书画和“四声猿”等著名的戏曲作品，深刻地暴露了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抒发他内心强烈的爱与憎，表现了他激越的爱国情怀和敢于同邪恶作斗争的精神，因此，深得人民的敬爱 and 后代人的怀念。他在文学、诗歌、戏曲和绘画上的卓越成就，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明末文坛，而且对以后四百多年的文学、诗歌、戏曲和绘画的发展，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徐渭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变化

(一)

徐渭，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田水月、青藤、青藤山人、青藤道人、青藤老人，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道人、天池渔隐、天池漱生，漱生，僧悔、金垒、佛寺、海笠、大环、长孺、孺子、钱孩、市叶翁、金回山人、山阴布衣、鹏飞处人、白鹇山人、鹅鼻山依等。明正德十年（辛巳，公元1521年）出生在浙江山阴（绍兴）县一个没落官僚兼商人的家庭。他的家族在绍兴城里原是一个名门望族，其祖上多是官僚豪绅，他的父亲徐鏊亦历任州县官。但这个曾经“雄视一乡”的徐氏家世，在徐渭出世之后，就迅速败落了。徐渭是徐鏊退休回籍后，晚年纳妾所生的儿子，在他出生后百日，徐鏊就病死了。徐鏊的原配童夫人中年死亡，生有两个儿子：徐淮和徐潞。继室苗夫人是贵州少数民族苗百户的一个守寡的侄女。徐淮比徐文长大三十三岁，是一个不务正业的贵公子，曾一再挑起家庭纠纷，“骨肉煎逼，箕豆相燃”。徐鏊死时，家中尚存数千两银子的资产，因此，一家生活还比较富裕。苗夫人善于治家，家中大小上下还和睦；因她不育，对徐文长特别疼爱，使他在襁褓之中受到优裕的待遇。徐渭有《春兴》诗说：“当时小褓慈帏绣，连岁寒衣邻女缝。一股尸虫忙万蚁，百须花粉乱千蜂”（《徐文长全集》卷七）。但是好景不长，在他十岁那年，徐淮经商亏本，终于把家产荡尽。由于家庭经济的破产，奴仆或被遣散，或逃亡，连徐文长的生母也被遣送出门了；在他十四岁那年，嫡母苗夫人又因忧愤成疾而死。这一连串的家庭变故，给他幼小的心灵以莫大的打击。他想到苗夫人对他的恩惠，感伤自己不幸的命运，写了一首《雪词》，轰动了绍兴城。此后，他只好跟长兄徐淮生活了。

徐渭自幼资性敏慧，六岁入家塾读书，启蒙老师管士颜教他读岑参《早朝诗》“鸡鸣紫陌曙光寒”，他只念了一遍就能背诵，深得老师的夸奖。他少年时代曾拜过十多位老师，如八岁向陆如冈学习八股文，十二岁向陈良学习古琴，十四岁向王政学习琴曲，十五岁向彭应时学习剑术①。在此期间，还拜陈鹤（海樵）为师②，学习戏曲、绘画，向杨珂（秘图）学习书法③。此外，汪应轸④、萧鸣凤⑤、沈炼⑥等这些正直官吏也曾是他的老师，在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上给了他极深的影响。徐渭父亲死后，家道虽然零落，但徐家毕竟是绍兴名门，亲朋故旧亦多是世家豪绅，如沈炼就是徐家的门婿。所以，徐渭自幼能处身于绍兴上层著名的文人学士之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上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养就了非凡的胸襟。他在青少年时代，视科举为唯一的出路，发奋好学，才华风茂，在绍兴城博得了“神童”之誉。他说：“渭少嗜读书，志颇闳博，自有书契以来，务在通其概焉。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九岁成文章，便能发衍章句，君

子缙绅至有宝树灵珠之称，刘晏杨修之比，此有识共闻，非敢指以为诳。”（《徐渭集》、《上提学付使张公书》）他曾自负地向“父母宗党誓说：‘功名何处不取？复似今日形骸，不上此堂也’！”可是命运偏偏与他作对，十七岁，他第一次应试，没有考取生员，二十岁第二次应试居然又未考中，这使他十分难堪。他觉得“激昂丈夫焉能婆娑蓬蒿，终受制于人？”就想走他父亲发迹的道路，到贵州去参加应试，但他毕竟不敢冒这个险，急得没法，只好上书提学付使，请求复试。他在《上提学付使张公书》中说：“徒手裸体，身无锱铢，去路修阻，危若登天，未尝通晓一艺，而欲致足万里之饗飧，不亦难哉？乞食于异域，委骨于他途，此所预定，不待知者而后知也。夫以伍员策士，志在报楚，犹吹坝而假食于蒲关，韩信壮夫，未遇汉王，尚垂钓而寄餐于漂母。有二贤才，以当分争之世，一时不遇，终日无赏；况于某者乏二贤之蕴抱，而无漂母之知人，虽亦有之，岂能遇地尽同者？步随情变，衣共体单，飘游云天，踟蹰霜月，进不能取功名以发舒怀抱，退则蒙诟当途，君子所不齿，乡曲不道，由食其出誓不为义人耳，比诸木偶，方以游芥，夫岂过哉！……畏路阻而处饥困，避道乞而将操瓢，是犹恶影而居日，恶臭而闻庖也。是故每至终夜淡为寂寥，起舞而为歌曰：鸿鹄兮高飞，昔时渡江兮何时能归？亡绝四海兮羽翼未舒，中路阻险兮当复依谁？慷慨三四，不觉泪下，悲哉悲哉，事未易为俗人言也！……伏冀明公悯其始终历涉之艰难，谅其进退患难之危迫，怜其疏鄙之才，援其今日无资之困。请假晷刻，试其短长，指掌之间，万言可就。或者才有可观，物非终弃，则愿挈之枯涸，置以清波，俾得饭茹糗粢，虽云弩蹇，尚奋驰驱。不过期月，则书生之学可通，假以三年，则道理之堂可造；语文章则跨制两汉，语尽性则驾轶四儒；此亦学者之志愿能事，岂敢夸张虚说以炫耀大人哉！……故敢述其始末，托书自陈，万一困其昏愚加以槟斥，则有负石投渊、入坑自焚耳，乌能俯首匍匐，偷活苟生，为学士之废弃，儒行之瑕摘乎！惟明公其生死之。渭恐惧顿首。”文中侃侃陈辞，倾诉自己饱读诗书、经史，空怀鸿鹄之志，困于乡里，不能摆脱穷困之境，痛苦之

注：

①彭应时，山阴人，中武科，为镇抚，因亢直被黜。都御史王抒镇浙，起用他练兵抗倭，不幸在乍浦战死。

②陈鹤字鸣野，号九皋，别号海樵山人。出身于世袭百户的军官家庭，因病弱，辞去世袭军职。擅长散曲，绘画，为绍兴文坛的盟主。

③杨珂字秘图，余姚人，幼事晋人帖逼真，善狂草，自成一家。

④汪应轸字子宿，山阴人，因反对武宗南巡，受廷杖。由庶吉士外放泗州知州。武宗南巡，他亲率民夫挽船，拒绝进奉女乐。后做过江西佥事、江西学政。为官清正。

⑤萧鸣凤字子雍，山阴人，少从王守仁学，正德九年（1514）中进士，授御史，因直谏武宗出塞，引疾归。后任过南畿、河南、广东学政。为官刚介廉明。

⑥沈炼，山阴人，进士出身，授溧阳县令，后为锦衣卫经历，因反对严嵩被害。是一位性情刚直的下级官吏。

情见于言表。提学付使张公看了他的上书，怜其处境“进退患难之危迫”，允许复试，正好遇着山阴县令方廷玺为提调，录取他为生员（秀才）。

徐渭家境艰难，因受潘克敬的青睐，不要聘金，选为赘婿。潘克敬由北京锦衣名法给事外放广东阳江县典史，顺道回乡，徐文长就随岳父去广东阳江结婚。妻子潘似，自幼丧母，对继母和家中人十分小心谨慎，徐文长仍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婚后不久，就接到二兄徐璐客死贵州的噩耗，徐璐因在绍兴屡试不中，就企图走他父亲发迹的道路，去贵州利用那里同族的军籍应试，结果未能如愿而丧身。徐文长亦曾有这个念头，二兄的不幸，因此使他更为伤痛。他二十二岁返乡应癸卯乡试，路经南昌，游滕王阁，想起唐代诗人王勃的不幸遭际，一时触景生情，写了《登滕王阁》诗，诗云：

“南浦雄州开水上，高台积翠绕天涯。
匡庐地远连秋树，荆楚山长入晚霞。
新阁不巢唐幕燕，暮林多下汉江鸦。
归船便下章门路，西去郊原日易斜。”

诗中大有飘泊天涯，前途渺茫之感。

嘉靖二十三年（1543），徐渭二十三岁，首次到杭州应乡试，未中。他又气又愧，从长兄家搬出，寄居别舍。两年后（1545），徐淮因服丹药中毒死亡，他父亲苦心经营的榴花书屋，遂被出卖。徐文长亦因“毛氏迁屋之变，”“为豪无赖所诳误，家殆尽”。困迫中，妻子因生了儿子徐枚，肺病加重，到次年（1546年）秋天就病故了；是年，他应丙午乡试又未中。至此，他已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了。徐渭的青少年时代是很不幸的，家庭悲剧一个接着一个，再加科举一再失意，使他的心灵受到了莫大的创伤。

徐渭在青年时代，曾与绍兴的一些著名文人结社，据嘉庆《绍兴府志》卷六十九《徐渭传》称：“渭与萧柱山勉、陈海樵鹤、杨秘图珂、朱东武公节、沈青霞炼、钱八山梗、柳少明文、及诸龙泉、吕对明称越中十子”。①他们中有的是退休的官绅，有的是丁忧在籍的官员，也有山林隐逸，以徐渭最为年少。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宗旨，与外地也没有什么联系，思想一般倾向于爱国爱民，反对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在文学艺术上主张推陈出新。徐文长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使自己的才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吴中（苏州）是江南的文化中心，对徐文长有很大的吸引力，经朋友介绍，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冬，他离开绍兴去太仓州谋求出路，但由于那里的官绅，文人们对他缺乏了解，结果失遇而返。不过吴中的文化，尤其是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陈淳诸大家的绘画成就和祝允明、王雅宜的书法艺术，以及魏良辅的昆曲，对徐文长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徐渭回到绍兴，乃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为谋生计，他在城东赁屋数间，设立“一枝堂”学馆，他自书楹联云：“宫墙在望居三卜，天地为林鸟一枝。”是取《庄子》“鹪鹩巢于林不过一枝”的意思。冬季，大雪纷飞，他孤栖“一枝堂”，倍觉凄凉，想到自己不幸的遭遇，心头充满了痛苦和忧伤。写了《一枝堂对雪》诗，诗中

云：“混混无穷处，茫茫不可知，翻思潜岳顶，仙去欲何之？”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感到怅惘和不安。他为求解决精神上的苦恼和思想中的问题，去拜王阳明的大弟子季本为师。

季本（1483—1562），字明德，号彭山。进士出身，因居官耿直，屡受贬斥，1544年由长沙知府解职还乡，中年奉王阳明为师。著有《龙惕书》，强调“致良知”当以警惕为功夫。他具有“精考索、务实践”的学风，与王阳明学派中那些空谈心性的人们有所不同，他对徐文长颇为器重，但徐渭对老师的思想观点并不盲从，对季本那种“驳先儒而复蹈其弊”的毛病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他在《奉师季先生书》中说：“然愚意窃有所献，大约谓先儒若文公者，著释速成，兼欲尽窥诸子百氏之奥，是以冰解理顺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剥之弊亦有，此正后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驳先儒而复蹈其弊，乃复为后人弄文墨之地也。解书惟有虚者活者可以吾心体度而发明之，至于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无考，则彼之注改为臆说，我之训亦岂身经，彼此诋讥，后先翻异，辟如疑狱，徒弗榜掠考讯之繁，终无指证归结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农桑劝课之典，休养生息之政，可以与民更始者也。近阅所传，可备参考，自此之外，则旁引曲证者，不过以夸多而斗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己说，遂至略人全文，则亦深文巧诋而可笑之甚矣。……故以著书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谓活者虚者，而事迹已亡，典故无考，彼为臆说而我亦未尝身经者，则姑阙其疑耳，若谓恐臆说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数语立断案而谈之足矣，不烦一一为一说也。”可惜，季本未能听取这些正确的意见，季本著书一百二十卷之多，本来企图代替朱熹的注解，但因内容繁冗和注解不精，未能流传。

徐渭拜季本为师之后，曾埋头刻苦学习，“及悔学，又志迂阔，务博综，取经史诸家，虽琐至稗小，妄意穷极，每一思废寝食，览则图谱满席间”（《自为墓志铭》）。他接受了王阳明、季本思想中积极的一面，更求务实，反对空谈心性，后来他在反对旧传统、旧权威、旧礼教、虚伪的伦理道德和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黑暗统治等方面，不亚于李贽，只是李贽表现在他的哲学思想上，而他表现在诗歌、文学戏剧和绘画上，他们对社会 and 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以上是徐渭三十岁之前的生活道路 他的青少年时代确实是很不幸的，痛苦和忧虑

注：

①萧勉字柱山，太学生。系徐文长亲戚，徐称他为“萧甥”。

△朱公节字允中，曾任彭泽县令、泰州知州。他的儿子朱赓与陈鹤的女儿结婚。

△钱梗字八山，进士出身，官至刑部郎中，弃官回乡，在秦望山的半岩修道。

△柳文字彬仲，山阴贡生。由贡生出任教谕，升县令。

△诸龙泉名大绶，字端甫，别字南明。中进士，由编修官至礼部侍郎。

△吕对明即吕光升，号莲峰，兵部尚书吕光洵之弟，新昌人。其弟吕光午（正宾），是浙江大俠，均与徐文长友好。

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无疑是很大的。不过，由于他处身于绍兴上层的一些正直的官僚文人之间，使他在思想上，文学艺术上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和影响。再加他的勤奋好学，从而成为一位博学多才、胸襟开阔的有志青年。为他以后才能的发展和发挥，及丰富的文学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在徐渭三十岁以后，国家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明王朝的日趋腐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北方有俺答、匈奴之患，东南沿海有倭寇之患，尤其是倭寇的侵扰，给国家和沿海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而明朝政权则在严嵩奸党的把持下，残害忠良，放纵官僚豪绅大肆侵夺民田，祸国殃民，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重。徐渭一面痛恨朝政的腐败，一面积极地投入反严斗争和抗倭战争，表现了他倔强的斗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徐渭三十一岁时，应归安潘钺的邀请，到杭州西湖玛瑙寺中为其伴读，与著名画家谢时臣、沈仕交往，切磋画艺。在寺中的一段生活，使他对僧侣的虚伪有所了解，后来他据《西湖游览志》所记《月明度柳翠》的本子，编写成《玉禅师翠乡一梦》杂剧二折，以暴露僧侣的虚伪和封建官绅的可恶。潘钺又邀请他到湖州，并为他介绍严知府的弟弟相识，严翁许以长女为继室，他因怀疑严家的女儿是傻姑娘，就拒绝订婚。后来湖州被倭寇占领，严翁和他的女儿被倭寇掳掠，严翁被杀，其女投水自溺，使他悔痛不已，作《严烈女传》以纪之。他三十二岁应任子乡试，初试名列第一，因此得为廪生，但复试又未考中。屡试不中，虽然使他的精神懊丧，但仍不坠青云之志，回到绍兴写了《涉江赋》，发泄他心头的苦衷和表白他坦荡的胸怀。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初夏，倭寇杀掠浙东，朝野震动，七月明政府任命都御史王抒为闽浙巡抚，浙江在野名流唐顺之到宁波、绍兴视察，访问季彭山、王龙溪，并找徐渭谈话。唐顺之是嘉靖八才子的首领，好谈经世致用的学问，精通武术和兵法，与晋江王慎中二人并称唐王，为文坛盟主。徐文长和唐顺之等人都竭力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文风，两人的文艺思想不谋而合，所以一见如故。

王抒起用俞大猷为参将，统率福建水师，将盘据舟山的盗魁汪直打败，汪直遂发动各路倭寇，向沿海各省大举进攻。俞大猷因屡败倭寇，受到浙东人民的爱戴，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秋，他到绍兴见王抒，徐文长联合绍兴城内市民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慰问。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一月，倭寇窜犯绍兴，在柯亭被官兵包围，歼灭二百多人。徐文长“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徐文长全集》卷十七）。次年倭寇百余人，又窜犯绍兴城东皋埠，徐文长随军到战地，“短衣混战士舟中观形势”，提出如何歼灭倭寇的建议，因此，打败倭寇。是年九月，陶宅战役大败倭寇，徐渭采访陶宅战况写了《陶宅战归序》。十月倭寇二百余人进犯绍兴，徐渭随典史吴成器在瓮山

歼灭倭寇，写了《瓮山凯歌》九首和《瓮山之捷》一文，以讴歌这次大捷。

这年秋他到杭州应乙卯乡试，初试得第二名，复试又未中。他一直考到四十四岁，连应八次乡试不中，他从懊丧到愤懑，在他后来写的《女状元》杂剧中，流露了对科举制度的不满情绪。如剧中第二折描写考试，借胡颜之口说：“运在宗师，不在胡颜，所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愿朱衣暗点头。”“若重在公论，又不消说，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了。”辛辣地揭露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春，徐渭三十六岁，到福建内兄潘伯海（妻潘似兄）处，认真地研究了南曲的发展史，写了《南词叙录》一书。此书不仅著录了前人未注意的南曲剧目，而且对戏曲改革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八月他回绍兴，陪季本到瓮山去看抗倭战场。因他有感于抗倭的广西少数民族军队中田州瓦氏，以女土司统率军队，作战非常英勇；又感于许多在倭寇屠刀下遇难的烈女的英勇事迹。依据古乐府《木兰辞》编写了《雌木兰》杂剧，热情地歌颂了木兰代父从军、保家为国的爱国精神，以激发人民的抗倭斗志。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秋，沈炼被宣大总督杨顺和巡按御史路楷串通严嵩诬陷为白莲教徒谋反，在宣化被腰斩弃市。长子沈襄在绍兴被逮送宣化下狱，次子、三子被逮下狱遭害，其妻带着幼子逃往大同避难。沈炼因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上疏参劾“严嵩十大罪状”，被革职，贬保安为民。这回又因他痛斥杨顺畏敌退缩，杀汉级以虜首报功，为杨忌恨，于是与严嵩串通诬害他。徐文长听到这一消息，悲愤填胸，画了一幅《雪压梅竹图》，又写了《哀沈参军青霞》诗，诗云：

“参军青云士，
直节凌遼古。
伏阙两上书，
裸衣三弄鼓。
万乘急宵衣，
‘当廷策强虏；
借剑师傅惊，
骂坐丞相怒。
遗帙辱帅臣，
筹边著词赋；
截身东市头，
名成死谁顾！”

赞扬他的骨气和爱国情怀。

他后来在《与诸士友祭沈君文》中说：“而公之死也，诋权奸而不已，致假手于他人，岂非激裸于三弄，大有类于挝鼓之祢衡耶？”他依此创作了《狂鼓史渔阳三弄》杂剧，藉以揭露和讽刺严嵩借刀杀人、残害忠良的罪恶行径。徐渭将《玉禅师》、《木

兰》、《称衡》和《女状元》四个杂剧合编称为《四声猿》。《四声猿》大胆地暴露了嘉靖中叶严重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表现了他敢于反抗封建压迫和忧国忧民的思想。

嘉靖三十七年（1557年）正月，胡宗宪以兵部右侍郎兼金都御史名义总督东南沿海各地对倭寇的进剿事宜，领导抗倭战争，他听到徐文长才华出众，招聘他入幕府，徐渭因忌胡是严党要人，坚辞不受，甚至卧床装病不起。但经师友的敦促，又为了更好地投身于抗倭战争，在胡宗宪答应保持他宾客地位的情况下入幕了。徐渭因为为胡宗宪代作《献白鹿表》，受到嘉靖皇帝的赞赏，轰动了京城；又因兵部郎中唐顺之认为徐文长的文章胜过他；再加“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谭兵多中。”因此，胡宗宪“愈折节等布衣”。对他十分器重，凡举事，“皆密相议然后行”。是时胡宗宪“威振东南，介冑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谭谑，了无忌惮”。而胡宗宪仍然十分尊重他，还特意借请徐文长撰《镇海楼记》送酬银二百二十两，以作他买宅之资。徐文长买得绍兴城东南地十亩，屋二十二间，命名为“酬字堂”。嘉靖四十年（1561年），他四十一岁，娶继室张氏，“食鱼而居庐”，一下由贫儒而变为富翁了。

是年嘉靖皇帝罢免严嵩，徐阶继任相位，严嵩失势，危及胡宗宪，徐文长性敏感而多疑，感到自己危机来临，胡宗宪送给他白鹇一只，他感慨地写了一首《白鹇》诗，诗云：

“片雪簇寒衣，
玄丝绣一围，
都缘惜文采，
长得侍光辉。
提赐朱笼窄，
羁迟碧汉违。
短檐侧目处，
天际看鸿飞。”

他以笼禽自比，心情是十分沉郁苦闷的。不久，胡宗宪就被问罪，逮捕解京，总督府遂被解散，徐文长因此也就失业了。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徐渭经杭州查某的介绍，接受了礼部尚书李春芳的聘银，当时沈襄正在北京为他父亲沈炼控诉申冤，他想乘便到北京以帮助沈襄控诉。但李春芳视幕客如奴仆，要求很严，连吃饭都要大家同席聚餐，这使他受不了；再加徐阶、李春芳把胡宗宪看为严党要人，非置其死地不可，徐渭为此感到在李的门下难以处身。而沈襄的控诉，仅得免其遣戍辽东罪，复保安学生籍；因严党还在挣扎，对沈炼的冤情一时还难昭雪，沈襄准备先去保安寻访父亲的遗骨。徐渭依此情况，决定解聘回乡。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徐文长回到杭州却被查某纠缠，徐渭变卖家产退还聘金，查某不收，威逼他回北京去。徐渭无法，只得返京向老同学修撰诸大绶求救，诸劝他向李春芳婉言谢绝，他不得已写了《奉尚书李公石麓书》，才得到李的允许，返回乡里。这一年倭患终于被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平息了。

胡宗宪因嘉靖皇帝念其抗倭有功，解职在家闲居。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被诛，因在严党罗龙文家抄出胡的信件，又被逮下狱，胡宗宪在狱中自杀。徐渭听到消息，当夜写了《十白赋》，在序文中说：“尚成十章，讽无由，且悲之矣。”他反对严嵩，但不反对胡宗宪。他认为胡有功亦有过，悔自己未能及时进谏言，以致哀痛愈深。他后来在《祭少保公文》中说：“于乎痛哉！公之律己也，则当思己之过；而人之免乱也，则当思公之功。今而两不思也，遂以懼于凶！于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于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终！盖其微且贱之若此，是以两抱志而无从。惟感恩于一盼，潜掩涕于蒿蓬！”（《徐文长全集》卷二十九）他对徐阶害死胡宗宪深表不满，同时也担心自己受到危害，悲痛中他画了《雪竹》，并题诗云：

“万丈云间老桧簷，下藏鷹犬在墻西。

快心猎尽梅林雀，野竹空空雪一枝。”

诗中深藏寓意，云间是华亭的别名，徐阶乃华亭人，云间老桧下藏鹰犬，自然指的是徐阶与他的爪牙；梅林是胡宗宪的别字，梅林雀当指胡宗宪与他的党羽，野竹句应是他自喻。

反严斗争和抗倭战争的胜利，对于一个曾经是积极地参加者，本来是值得高兴和庆贺的大事，但由于胡宗宪的被害，不仅使他陷于失业和贫困，而且使他的精神处于极度的不安和痛苦中。他一方面因知遇胡宗宪，“居常痛少保功而谗死，冤愤不已，而力不能报”；一方面又怕受牵连，心中忐忑不安，悲观厌世，以致成狂而决意自杀。他写了一篇《自为墓志铭》，文中说：“至是，忽自觅死。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无以葬，独余书数千卷，浮磬二，研剑图画数，其所著诗若文若干篇而已。剑画先托市于乡人某，遣命促之以资葬。”他发病初期，心情烦躁，狂走不休，此后遂发真狂，他用利斧击破自己的头部，“血流满面，头骨皆折”，不死；又拔壁上三寸长铁钉刺入耳窍。他在《海上生华氏序》中说：“予有激于时事，病瘼甚，若有鬼神凭之者，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贯左耳窍中，颠于地，撞钉没耳窍，而不知痛。逾数旬，疮血迸射，日数合，无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计，人作虺蜥形，气断不属。”徐渭连续自杀好多次，写了《自为墓志铭》，还请木匠制好棺木，他有《感九诗》云：

“负病知几时？朝雪接炎伏。

亲交悲诀词，匠氏已斤木。（棺已就）

九死辄九生，丝断复丝续。

岂伊耿德躯，而为神所笃？

就榻整旧编，扶衰治梁肉，

纳策试翱翔，渐可征以逐。

天命苟未倾，鬼伯谅徒促。”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文长四十五岁，在狂病中疑其妻不贞，将她误杀，因此下狱。陶望龄说他：“为人猜而妒，妻死后，有所娶即以嫌弃，至是又击杀其后妇，遂坐法，系狱中。”徐文长入狱整七年，开始他认为自己难免一死，因此心绪非常悲观厌世，“今日稽康知不免，懒将消息问孙登”（《杨道人访余于系》）。他写了《上郁心斋书》为自己辩护，并托沈襄再次上京为父伸冤之便，向老友诸大绶求救。诸已升任礼部侍郎，出力营救，使他得免死刑。拘禁头四年，他因身受枷桎，心情很坏，不便读书写作。仅有《周易参同契注》和与一些朋友往来的书信和诗文。隆庆三年（1569年），他五十生辰，朋友门生都到狱中为他祝寿，他写诗答谢，心绪仍然不佳。春天，同乡好友张元忬在北京会试中了状元，他听到消息后高兴地写了《贺新郎》一词。原先极力营救他的老友诸大绶在隆庆四年死了，现在能营救他的主要是张元忬，张中了状元，自然对他有利，所以他一时心绪舒展。他在下去枷桎后，就努力将自己的诗稿编成《阙编》和《抄代集》。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皇帝朱载堧死，皇太子朱翊钧即位，由于张元忬等乘万历改元，大赦天下之机，竭力保释；十二月除夕，徐文长终于被保释出狱，是年徐文长已五十三岁了。

徐渭中期的生活道路，仍然是很不幸的。他原想通过科举发迹，报效国家，却屡试不中，“英雄失路”，空怀报国之志，常处于“托足无门之悲”中。妻子的夭亡，家庭经济彻底破产，使他落到赤贫的地位。尽管如此，他仍然忧国忧民，壮怀激烈，以一介穷书生的身份，积极地投入了抗倭战争和反严斗争。然而，抗倭战争和反严斗争的胜利，却给他带来了不幸，他失业了，而且因胡宗宪案，疑虑自己在政治上会无辜受牵连，以至精神失常，决意自杀，最后因误杀继室而进了监狱。徐渭的命运的确是不幸的，令人不禁为之唏嘘长叹！但是，我们则从他的政治表现和大量的文艺作品中看到，他乃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抗封建礼教，敢于同邪恶作斗争的高尚的文学家，因此，又令人不禁为之肃然起敬了。

（三）

徐渭出狱后，就进入了他一生的晚年阶段。重见天日的徐文长，完全陶醉在大自然中，他天天偕同门生出游，万历二年（1574年）他游了诸暨五泄，写了二十首记游诗。他给诸暨陈仲子绘雪景图，题画诗中有云：“腊酒此时热，老夫终岁忧。壶公能醉我，跳入画中休！”看来，他是企图借自然山水和酒醉来减轻心头的苦楚。然而，这只能是一时间的，半生落魄的痛苦生涯所郁结在他心头的苦痛是难以消除的，正如他的《题墨葡萄》诗云：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